

冲破死循环，拥抱新世界——讨专制檄文

庄生蝶

如果只反专制政体，不反专制思维，则专制的死循环便会形成魔咒，永不能去。未来的新中国，必须摒弃大一统思想，必须打破“党天下”的黄粱梦，迫使中共退出历史舞台，并还权于民，还国民以选票，使未来的政权更替得以在和平环境下由人民做出选择。

一、冲不破的死循环

中华文明迄今已逾数千年，上古尧舜禹，曾创禅让制，朝代更迭举贤者上，遂居四大文明古国之列；夏商周春秋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，孔孟老庄更创华夏文明之高峰。然自此之后，中华王朝即陷入高开低走的窘境。

秦皇嬴政开启专制暴政之恶源，虽二世而亡，却给后世留下文明负资产，此后的每一次朝代更替、政权易手，除了换个皇姓之外，并无根本改变。相反，每一个以暴力攫取政权的皇帝，又以更血腥的暴力维护自己的统治，实际上是一家之统治，所以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”，“国家”这个怪异的词汇就这样被发明出来，这个词的词根是“家”，这个“家”绝不是万民之家，而是皇帝之家。皇帝就这样既心安理得又恬不知耻地永久窃取了“国”，让“国”成为他的“家”。

梁启超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：“中国两千多年的制度，犹秦制也。”他进一步剖析“数千年民贼既以国家为彼一姓之私产，于是凡百经营，凡百措置，皆为保护己之私产而设”，这是“中国数千年来

政术之总根源”。故而，两千多年中，历朝虽然版图在变化，人才在辈出，物质在积累，而民众陷于沼泽、沦于贫困、生于恐惧的命运从未改变过。中国的王朝便在周而复始地重复着一条路：推翻前朝、复制前朝、成为前朝，始终走不出从痛恨暴政到模仿暴政、升级暴政、实行专制的死循环。

在历史上，中国曾经有过走向光明、背离黑暗的机会，而且不止一次，遗憾的是，我们每一次都会错过改善的机会，甚至每一次都会选择最坏的结果，原因表面看来似乎无解，其实内在逻辑非常清晰，因为每一次的选择都是帝王的选择，而帝王的选择都会以获取皇家利益、牺牲国民利益为核心，因此每一次的选择都是一次背离文明、进步的逆向选择，在统治者的眼中，除了维持王权，一切都无足轻重，为了维护王权不惜与国民为敌、与世界对抗。这就是两千多年中国式悲剧的根源，正是因为这样的专制怪圈，导致中国长期不能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。而在文明进入高度发达的今天，中国如果不能冲破这种死循环，便难以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，甚至会成为文明世界的弃儿。

当今中共自 1949 年建政后，以前所未有之恶，给中国人民乃至世界带来深重灾难，七十年代末虽启改革开放，使中国社会稍得喘息，经济从崩溃中走出，但由于中共专制制度并未改变，因此在经济畸形发展的同时，社会整体文明程度反向恶化，法治环境日益崩坏。

直至习氏当国，改革开放的成果也被挥霍一空，国内政治生态日趋险恶、人民生存空间日益收缩、经济去除泡沫化后正面临崩溃，在国际上，中共屡次站错队伍，走向世界文明的反面，与同样邪恶的专制政权为伍，破坏国际原有秩序。

值此内忧外患之际，中国面临一场深刻的危机，如果不能顺利化解这场危机，中华民族将遭万劫不复之命运。而化解这场危机的唯一方法，便是结束专制政权，建立宪政国家，实现民族和解，拥抱文明世界。

谨此向祸害至今的专制独裁制度宣战，全球华人同胞及一切热

爱民主、自由、和平之人士，均可加入我们的行列。

专制一日不除，征讨一日不止。

二、中共之恶

中国专制的死循环在今天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，其暴烈之剧、控制之严、镇压之酷、前景之危，已令每一位中国人忧心如焚，无论是身在墙内的国民，还是流亡海外的同胞，无不痛心疾首、夙夜无眠。而让中国陷入今日之危的罪魁祸首便是中共，是他们通过七十多年的残暴统治，一步步把国家从文明世界分离出去，并进而成为当今世界少数的专制独裁异数。

中共之恶，罄竹难书，仅略数其十恶于下：

第1恶：消灭自由

中共与一切天赋人权为敌，视自由为洪水猛兽。公民所应该享有的言论、出版、集会、结社、游行、示威、宗教信仰等诸种自由皆被剥夺殆尽。共党曾讥讽国民党时代的报刊审查制度，但事实上在那个时代，中国产生了鲁迅等大量批评政府的知识分子，报刊、出版社也在民间活跃异常。中共建政后，即将新闻出版等本属民间的行业纳入党政系列，一律国有党控，导致其篡政七十多年，大陆的新闻出版完全颠倒黑白，成为愚民工具。偶有冒险著作者，轻则禁书禁言，重则投放监狱，中共1949年篡政后的文字狱，远超中华历朝文字狱之总和。毛泽东反右、文革等运动时期自不待言，及至习近平今日更甚于往，中国作家学者无不胆战心惊、如履薄冰、下笔如有绳。

因为极其严苛的审查与迫害制度，导致近几十年中国在人文社科领域对人类毫无贡献。在历次政治运动中，知识分子都成为被整肃对象，中共通过对知识分子长期的无情打击，使得本应该成为社会良知的智慧人群，反成为愚弄人民的工具与帮凶，极少数正直、敢言的知识分子不是在监狱，就是被迫出走异域，而大陆则沦为网络高墙下

的超大监狱，现在香港、澳门也已落入监狱，中共更将魔手伸向下一个目标，正欲将台湾纳入这个超大监狱。

第2恶：摧毁法治

法治是文明国家的基石，但在中共眼里，却是最恐惧之物。一部中共宪法就是摧毁法治的最好注解。全世界自有宪法以来，没有一部可以公然将某党领导作为总纲，让宪法在高悬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下瑟瑟发抖。在“东西南北中，党是领导一切的”的原则下，本应至高无上的法律便成为匍匐于党下的废纸。

作为一国之根本大法的宪法，本应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，制定后便须一以贯之，但中共却会随时根据党魁需要做任意修改与解释，以至于在最近的一次修改中赫然将习近平的任期时限改为无限期，曾经明文废除的终身制再次死灰复燃，对宪法的践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。也因此，所谓“中国梦”便彻底沦为习贼一人之帝王梦。

宪法尚且如此，其他法律条文更是形同虚设，公检法司也成为党的工具，功能只剩下消灭异己、剪除对手。更为荒唐的是，中共设立了一个公检法司之上的机构：纪委，表面上这是一个党内的监督机构，实际上在中国，稍微出色一点的人都被罗织于党内，因此它是迫害民众的又一工具，而且因为纪委无需公开、透明，也无任何法定程序、监督机制，因此使公法成为私刑，最基本的人权便如此被践踏。

当然，法律条文也并不总是无效，它在对付人民时，会变得异常高效和坚硬。但即使在对付普通民众的民法与刑法中，法律也毫无公平、公正而言，因为中共崇尚暴力至上，导致司法实践中腐败横行、欺软怕硬，形成事实上的无法无天。

第3恶：抢夺民产

中共起于草莽，兴于暴力，夺取政权前，曾以“共产”为民众画饼，使饱受缺衣少食者产生幸福幻觉。但事实残酷，中共篡夺权力后，

不仅未能兑现当年承诺，反而将乡村农民手中原有田地悉数收回，城市工商业者失去赖以生存物业，更以公私合营、三反五反等运动消灭一切有产者，此时人们大梦方醒，所谓“共产”乃“共同交出财产”之意，但在虎狼之师的枪杆下，人民已无任何反抗之力，只能任人宰割。

中共在强取豪夺国民私有财产之后，将空前巨大的民脂民膏一分为三。其一，分赃给统治集团内少数权贵家族，以便于继续维护对民众的控制；其二，建立人类有史以来最庞大、最多层的各级伪政权，这些伪政权完全依赖百姓供养，却将武装到牙齿的专政工具转而对付供养他们的衣食父母；其三，中共对内镇压，对外媾和，用纳税人的金钱结交世界上所有的邪恶国家，与这些同样野蛮、落后、专制的国家结成邪恶同盟，以对抗欧美主流文明。

而在对民脂民膏的分配上，人民没有丝毫话语权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称谓已严重名实不副，既无人民、也无共和，只剩下古代帝制的复制品与升级版。

第4恶：破坏人伦

中共对大陆的统治，是以破坏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人伦纲常为前提，假文革与城市化之名，美其名曰“移风易俗”，借机拆除宗庙、祠堂，烧毁家谱、方志，取缔乡风、民俗，使华夏文明史在当代遭到无情割裂，放眼今日之中国，已无几家明瞭祖先家史与传承脉络，传统文脉、血脉均已遭横刀割断。

回望中华古代史，虽屡遭战乱外祸，但士绅阶层并未从根本上消除，故战乱平息后，社会便迅速得以恢复，家族、乡里、社会并未彻底颠覆。此种民间的自我管理系统，历数千年而未曾消亡，并成为乱世重整的有效力量。但在中共的铁拳重击下，士绅阶层被彻底铲除，共党组织侵蚀乡间里舍，鹰犬爪牙渗透社会细胞，举国皆党天下，实则为党主席天下矣。

第5恶：绞杀信仰

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，宗教信仰一直成为民众的精神寄托，也是民众减轻现实困扰的疗愈方式。但在中共治下的中国大陆，信仰自由只在口头上和纸面上存在，实际上绝无生存空间。

中共把自己的所谓“共产主义”这一政治目标，伪装成信仰硬塞给人民，并写进宪法，强迫全民信仰。而对佛教、道教、基督教、伊斯兰教及其他宗教，采取高压、打击态势，寺院、道观、教堂、清真寺等宗教场所，均必须每日升国旗、奏国歌、颂党恩，宗教场所内甚至将中共党魁画像与宗教偶像并列，严重侮辱与贬损各大宗教。而有些小众宗教因与共党理念不合，便被打成“邪教”，教徒等于罪犯，举国共灭之，全民共讨之。

其实，共党所鼓吹之“共产主义”信仰，连他们自己都不信，却将这样一个反人类的所谓信仰，强加于追求信仰自由的民众，这本身就是荒谬和无理的。事实上，中共具有一切邪教的特征，它本身才是世上最大的邪教。

第6恶：践踏民主

中共一贯口是心非地大喊“民主”口号，甚至自欺欺人地宣称中国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，甚至不惜虚构出“全过程民主”的谎言，事实上中国人民从来没有见过那张想象中的选票，更遑论一人一票的选举权，无论是哪一级官员都不是民众选出来的，即使那些有所谓选举权的“人民代表”“政协委员”，也都是按照党的强制指示在无差额的选票上划圈而已，现在已经发展到连画圈也不需要，当众举手、直接鼓掌、一致通过了。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“全过程民主”，是对民主制度的最大蔑视与嘲讽。

民主的本义是“由民作主”，而中共的伪民主，究其实就是“代民做主”，他们视民众如无物，他们代替人民做出的任何决定，人民

都必须无条件接受，而且还要感恩戴德地接受。

第7恶：种族灭绝

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并存的国家，但在中共篡政后，即对各少数民族进行系统的打压，直至种族灭绝。新疆、西藏、内蒙等少数民族地区都是以兵临城下的方式实行占领与吞并的。

这种占领与吞并伴随着血与火，成千上万的少数民族人民均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。更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，占领与吞并之后，如果能够让少数民族地区走向丰衣足食、繁荣富强，倒也至少对民众有所交代，岂料中共志不在此，他们并不想让少数民族地区摆脱贫困、走向繁荣，更不希望他们享有内陆发达地区的经济成果。相反，中共像欺骗汉族同胞一样地欺骗少数民族同胞，他们打出“自治”这一掩人耳目的旗帜，现实中所有的少数民族地区均未能得到最基本的自治权，反而在中共的残酷管制下，人员不能自由流动、自然资源不能自主开发、民族文化被汉文化取代，稍有不从，即招致武力镇压，销门灭户甚至荡平村庄已非孤例。

至今，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区域都是国家级贫困地区即是明证，人们不禁要问，为何美丽富饶的少数民族地区，无一不生活在平均生活线以下？这是谁之过？

第8恶：蹂躏文化

中共打着五四“砸烂孔家店”旗帜上台，以反传统为名，引入苏俄血腥文化，它从立党之日起，便尊马克思、列宁为教祖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学说，源自撒旦教，本就荒谬无稽，而且所描绘之未来蓝图，并未经任何社会实践，但即使是这样的一家之说也遭苏俄及中共阉割和取舍，据学者研究，马恩最重要的几部著作都被列宁、斯大林随意增删篡改，中共引入中国时，再次遭到大规模删改。它们均以各自功利目的，塞进与己有利的私货，使本已是无根之木的谬说，更成

枯枝败叶之教条，这样的病树无法结出善之果，只能开出恶之花。

中共篡政后，用马列谬说改造中华文化，将大量古代经典，一概打入冷宫。首先以“扫盲”需要，把一个古老的、自成系统的象形文字强行改成“简化字”，这个以“扫盲”为掩护改造文字的幌子，愚弄了普罗大众，这牵涉到一个基本教育常识，即文盲多寡的根本原因是文字繁简吗？文盲的多寡根源在于受教育的权力是否得到保障，受教育的机会是否公平。倘若简化字比繁体字好学，那么试问，中国大陆的文盲率为何远远高于香港、台湾及海外华语圈？简化字成为当代中国人集体与传统典籍互相隔绝的利器，传统的断裂便从那个时候开始了。直到文革，再行全民焚书运动，知识分子被污为“臭老九”，再蹈秦始皇“焚书坑儒”覆辙。毛泽东曾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大放厥词：“秦始皇算什么？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，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”，“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，你骂我们是秦始皇，不对，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。骂我们是独裁者，是秦始皇，我们一概承认。可惜的是，你们说得不够，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。”一个公然自认为超过秦始皇一百倍，自认为独裁者的独夫民贼，就是这样让一国陷入彻底反传统、反文化、反常识的绝路。

中共除了反文化，也创造了自己的“党文化”，这就是“暴力文化”“斗争文化”“谎言文化”“愚民文化”，对于他们来说，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的“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”，成为它们尊奉的圭臬。中共最重要的部门便是宣传部，一切文化、教育乃至卫生部门都在宣传部的统领之下。中共的文宣不仅肆虐于大陆，又祸乱于港澳，现正以超限战方式向海外渗透，试图破坏民主国家业已形成的文明结构。

第9恶：滥用科技

众所周知，科技是现代人类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力，科技造福于世界。但是科技具有两面性，如果没有人文与良知的指引，往往也会成

为毁灭人类的武器。而中共正是在马列邪说的指导下，将科技用于控制人民、奴役大众，使得全体中国人民深受科技之伤、科技之害、科技之苦。

中共利用互联网大数据，将全民的生物信息非法采集，用于全民监控手段，神州无处不探头（视频监控），它们通过面部识别系统、手机信号、指纹信息等等，实现对全民的全天候、无差别监控，发现“异议者”，即以全套监控手段非法监听、监视，进而限制人身自由，使得中华大地已成无形之监狱，全体国民已成变相囚徒。人人胆战心惊，个个惊弓之鸟，每天活在巨大的恐惧中，这种恐惧让普通民众逐渐失去反抗的能力和欲望，最终浑然不觉地成为笼中鸟、网中鱼。

为了更好地实行信息封锁，中共在网络化时代开发出闻所未闻的网络“防火墙”，屏蔽一切境外网站，使国民只能接受它们愿意传达的信息，这道高筑的网络防火墙，使得网民被迫栖居于网络时代的信息“茧房”，获得经过刻意过滤的信息，成为新世纪的井底之蛙。这极大地阻滞了国民的认知能力，损害了国民的判断力，使得中国真正成为一个“墙国”，墙内与墙外活在两个世界中。

第 10 恶：洗脑教育

中共深知“从娃娃抓起”的重要，因此它们把教育纳入宣传系统，从幼儿开始，接受经过它们恶意改造的教科书，尤其对人文社科领域的知识进行全方位改写甚至伪造，并将马列主义置于一切学科之上，通过这种奴化式洗脑教育，伴随每一位中国学生小学、中学、大学教育的全过程，是一代又一代学子走向弱智化、反智化。

中共教育的一大特色，是扼杀个性、天性、人性，使得孩子从进学校起逐渐格式化、服从化、工具化，最终沦为一代又一代识字的奴隶，他们没有批判意识、缺乏反思精神，更无追求真理的勇气。民国历史学家陈寅恪曾经倡导的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，在今日之中国已经荡然无存。

在这种教育理念与教育制度下，中国人已经集体失去创新能力，所以缺乏原创，只能靠模仿甚至剽窃西方科技，才能获得一些有限的发展，偶有突破，也大都来自接受西方教育的海归者。

中共排斥异端、坚持一尊的封闭式教育模式，连曾经的蒙、满异族统治者也自叹弗如。蒙元灭宋、清军入关后，虽以征服汉人自居，但都迅即依循了汉人的科举制度，且尊儒学、兴汉文，并未一味强加自己的文化于全国。而中共反儒批孔、抛弃祖训、引入马列、祸乱中华，已让中国陷入周而复始之厄运，可悲！可叹！可恶！可恨！是可忍，孰不可忍也！

三、巨变之前的选择

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察觉，我们已经到了又一个十字路口，面临又一次艰难的选择。我们是像前人那样再次与机遇擦肩而过，还是抓住最后的机会融入世界文明的洪流？

这个选择就是：冲破死循环，拥抱新世界。而做出这个选择的最大障碍就是，中共的专制政体。只有彻底推翻并摧毁中共专制政体，才能完成这个史无前例的选择，进而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。但在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之前，必须先回答几个无法回避的问题，否则我们将再一次回到起点，甚至继续朝着深渊坠落。

第1问：我们准备好了吗？

上世纪的八九六四民主运动是一次反抗专制暴政的全民性运动，这在当代史上是第一次，六四民主运动给当时的专制政权以沉重打击，在其以军事镇压手段在全世界面前暴露出彻底反人类的政权本质时，更多麻木不仁的民众在昏睡中醒来。

但由于六四运动是一次缺乏理论准备、组织准备、目标设定的被迫式反抗运动，因此在被镇压后并未于民间孕育出更多的果实。而参与六四运动的民主人士在遭残酷整肃后，大多流亡海外。

这本是一次民主力量在海外集结，进行反思的绝佳机会，可以从理论、组织、目标等诸方面进行深入探讨，并为下一次民主运动的到来做充分准备。然而，遗憾的是，在一个自由、安全的环境中，人们并没有看到反对专制、自由民主的力量大集结，相反，这些本应是同战壕的战友却因为目标不一、各自为战，出现一盘散沙的局面，甚至在各种无谓的争执中互相攻讦、诋毁，这从某种程度上帮助了本该日薄西山的伪政权，使其得以苟延残喘，并变本加厉地走向极端专制。

因此，如欲征讨中共专制，必先整合民主队伍，海内外一切反专制团体与个人，必须放下成见，搁置争议，以推翻中共专制为目标，以实现民主为使命，只有团结起来，携手并肩，才能打垮中共这个前所未有的邪恶政权。

在所有的准备中，民主素养的培育是最重要的准备，胡适先生曾言：“宽容比自由更重要”。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，必须由不同理念的左中右人群组成，由不同的人群实现共和，方为健康社会，如果一个社会只有一种意见和声音，那便又成为另一种专制社会。孔子曰：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。说的也是这个道理，君子可以在保留各自不同中和谐相处，而小人即使同流合污一时但终会自相残杀。

海内外一切反专制者，倘能包容各种不同歧见，均以民主大业为重、以推翻专制为念，放下各自的观点纷争、意见分歧，才能形成合力，推翻中共。所以，必须锁定终极目标：推翻中共，消灭专制。

全世界反专制者团结起来，摒弃一切团体之争、利益之争、观点之争、路径之争，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，只有这样，专制崩溃的那一天才会到来。让一切专制政权在团结起来的民主力量面前发抖吧！

第 2 问：讨共还是讨专制？

就反专制政体而言，推翻中共是必须迈出的第一步，但切记这仅仅是第一步。反专制必反共，但反共不等于反专制。因为反共只是手段，反专制才是目的。

务必要从思想深处认识到这一点，中共是毛，专制是皮，不消除专制之皮，只清除专制之毛，中共即使推翻，专制也会卷土重来。苏俄便是先例，苏东剧变后，苏联解体，苏共成为在野党，但因为没有对专制独裁制度的深刻批判，权力崇拜、偶像崇拜仍然大行其道，因此在推翻苏共之后，又催生了另一个升级版的独裁者——普京，其对俄罗斯以及世界之害，更胜于苏联。

中共是专制的产物，专制的土壤便存在于中国文化与教育的每个细节中，甚至躲藏于普罗大众之中。必须消除非黑即白、有我没你的专制思维，这种思维不仅为中共独有，扪心自问，民主人士中也不乏其人。一言不合，即互相诋毁的局面应该为所有真正追求自由、民主的人士所警惕，倘不能彻底消除专制思维，则专制团体、专制党派仍然会借尸还魂，中共换了马甲仍然会以各种形式粉墨登场，那么我们今天反的东西，便是明天我们要维护的东西。如果只反专制政体，不反专制思维，则专制的死循环便会形成魔咒，永不能去。

第3问：死循环的死结在哪？

纵观中华历史，为何历朝历代都无可回避地陷于专制的“死循环”？究其根本，原因在于未能解开统治者的两大死结，如果我们今天反专制，不能走出历代王朝的思想误区，不解开那两个死结，则无法完成反共乃至反专制的大业。

死结之一：“大一统”的妄想

中华一直以帝国形态存在，从来没改变过，而帝国的要件之一便是“大一统”，“大一统”的标志是：舆论一统、疆域一统、体制一统、机制一统。

在大一统的旗帜下，只能有一个声音，任何的不同意见都被判定为“杂音”和“异端邪说”，而在大一统口径下的言论，最终导致了言路越来越窄，选择性过滤的假话包围着统治者，皇帝便在这种虚假

的氛围中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做出错误抉择，最后走进死胡同。

在大一统的旗帜下，只能有统一疆域，而且这个疆域只能扩大、不能缩小，历代皇帝只能接受“万邦来朝”，不能接受分封割据，周朝以王权分封的“封建制”，经过秦朝的摧毁后，便不复存在。现代历史教科书对古代社会概括为“封建社会”是完全无视史实的，自秦统一六国以后，分封制即已死亡，取而代之的是中央集权，地方官员由中央外派，偌大的中国实行同一部律法，而这部律法就是“王法”。在这种大一统的管制下，地方毫无自治权，不能根据地域差异做出差别施政，导致地方在服从的姿态下的离心趋势。一旦发生战争、灾难，便极易产生蜂拥而起的抵抗力量，最终推翻王朝，实现改朝换代。

此外，要认识到，国家统一不等于大一统。美英等民主国家，并不追求大一统，在国体上实现三权分立，行政、立法、司法互相独立，互相牵制，互相监督。同时均能在国家统一的前提下摒弃大一统，即在承认国家主权的前提下，地方拥有相对独立的立法、司法、行政权，最大程度地遵循不同地域因地制宜的策略，避免盲目的统一政策、统一步伐。未来的新中国，必须摒弃大一统思想。

死结之二：“家天下”的顽固坚守

在皇帝看来，国家是他的私产，国民是他的家奴。所以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”便根深蒂固地融入统治者的血液。既然是“家天下”，那么所有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财产都归于皇帝；既然是“家天下”，那么所有土地上的人民也都属于皇帝，他们的利益乃至生命也都由皇帝予取予夺。

“家天下”观念如此顽固的理论基础在于，皇帝们都认为江山是他们的祖先打下的，因此也必须世代代由他们家族继承，所谓“打江山，坐江山”。皇帝认为自己的皇权是天定的，任何试图改变现状的行为乃至想法，都是不可接受甚至必欲剪除的祸端。于是，王朝的更迭便一定与血雨腥风相伴，因为皇帝把国家作为自己的私产，因此

人民便成为皇帝捍卫私产的牺牲品。数千年来，中华大地屡遭战争荼毒，而统治者从未从前朝的失败中得到教训。

中共以战争攫取政权后，虽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，却全盘继承了历代皇帝“家天下”的思想，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，“家天下”在今天俨然成为“党天下”。

中共认为今天的江山是他们“抛头颅、洒热血”夺取的，便理应千秋万代把江山坐下去，谁若想取代他们，那也必须付出“头颅”和“热血”，这种赤裸裸的“家天下”的皇权思想，是中共自认执政合法权的基石，这种权力不容他人染指。即使在民主化时代，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自由、民主呼唤，仍然置之不理，进而史无前例地动用军队镇压人民的和平请愿。为了捍卫他们的江山，中共把军队改造成一党所有，军队本应是保卫国家的利器，却在中共的改造下，成为一党之私器。

“党天下”所拼命保卫的利益，也非真正的党的利益，而是党内最高统治者和少数既得利益者的集团利益。简言之，也就是红二代、红三代的利益。“党天下”便是这些“红二代”“红三代”的天下，这些躺在祖荫下的新权贵，在一个民主化的时代，做着永远世袭的美梦。反专制，就必须打破“党天下”的黄粱梦，迫使中共退出历史舞台，并还权于民，还国民以选票，使未来的政权更替得以在和平环境下由人民做出选择。

只有打开这两大死结，中华民族才有生存之可能，否则必将成为专制政权的殉葬品。

新世界的曙光正在散发出璀璨的光辉，人类历史的洪流正在涤荡一切污泥浊水，从世界范围看，正邪较量正进入白热化，世界秩序的重新构建已在进行中，中华民族必不能游离于世界大势之外，而应迎头追上这个千载难逢的大变局，这个苦难深重的古老的国家，到了浴火重生，凤凰涅槃的关键时刻。

让我们拥抱这个即将到来的和平、民主、自由的新世界吧！